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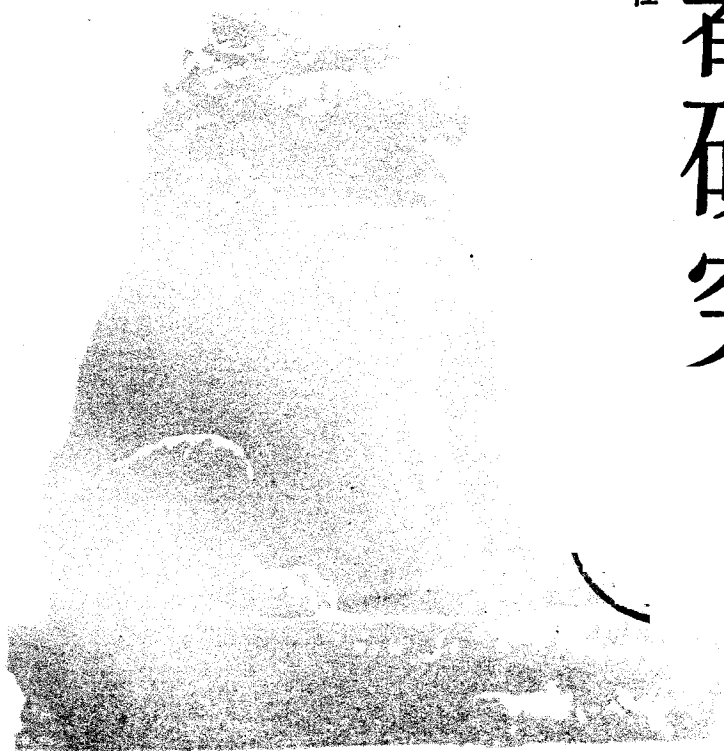
中国古都研究



中国古都研究

(第二辑)

浙江人民出版社



装帧设计：郦文龙

责任编辑：王福群

中国古都研究（第二辑）

中国古都学会编

*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5 插页3 字数169,000

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900

统一书号：11103·165

定 价：1.20 元

前 言

史念海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中国古都学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在南京举行。会议期间共收到论文七十五篇，编入本书的有十六篇。

一个都城形成、发展、变化和废省，关系到许多方面。总的来说，有自然方面的因素，也有社会方面的因素。每个方面都还可以详细罗列，分成若干较小的项目。在建都时期，它几乎成为全国社会的缩影。就在都城废省之后，也还有相当的影响。它的遗址遗物，尤为研究者所珍视。当前，社会主义建设正在全面开展，有些古都在今天仍居有一定的重要地位，如何在旧的规模上从事新的建设，更为举国上下所重视。这些广泛的内容和各方的期望，在这次会议讨论中自然得到了相应的反应。所提出的论文大体都是就古都的各个方面的论述。各篇论文各自具有特点，总的说来，却都是想为当前的四化建设作出一些贡献，也为古都学的研究奠定初步的基础。

对于古都的研究，近年来在我国已经引起各方面同志的注意和重视，也陆续发表了若干重要的论著，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不过对于古都学的建树，却还有待于继续努力。正如

前面所说的，古都研究的内容相当广泛，包罗有关的各个方面。作为科学的古都学，它将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历史、地理、考古、交通、建筑等学科。这些学科都和古都有关，是研究古都所不可缺少的。可是仅仅从事某一方面的研究，都只能是古都学的一个方面，而不能以之代替古都学。古都学应是这些学科的综合研究，它应是一门新的学科。

当前在一些已有的学科范围之间，形成了不少的边缘学科。这是学术发展的新趋势。因为事物的形成、发展和演变是多方面的，单从某一个学科来解释，往往难以作出详尽的说明，不能不借助于其他的学科，而其他的学科又不能包括在这一学科之内，这就必然会形成边缘学科。这种边缘学科逐渐演变，就和原来的学科分离，成为新的学科。对于古都的研究也是如此，由于它包罗的广泛，还不应是一般的边缘学科，而是综合许多学科的新学科。

对于古都的研究，由于各方面的重视，工作正在不断开展之中，将来的发展一定会建立一门古都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而和其他学科并列。从事古都研究的同志，当为建立这门新学科而共同努力。这个论文集的编印就可作为前进的一个起点。

目 录

- { 1 } 前言 史念海
- { 1 } 我国古代都城建立的地理因素 史念海
- { 31 } 关于我国历代建都与文化史发展的关系及建
都特点的初步研究(纲要) 李炳均 刘敬坤
- { 42 } 魏晋南北朝都城形制试探 郭黎安
- { 61 } 对金中都与元大都水利工程一些
问题的探讨 苏天钧
- { 75 } 清代宫俗与京师民俗 万 依
- { 83 } 汉唐长安地区的宏观地理形势与
微观地理特征 朱士光
- { 96 } 元代重建灞桥的又一重要文献——张养浩的
《安西府咸宁县创建灞桥记》 李之勤
- { 107 } 古代洛阳的五大城址 赵芝荃 徐殿魁
- { 121 } 试论洛阳汉晋墓碑和墓志 官大中
- { 134 } 开封汴河与州桥 徐伯勇

〔 144 〕 开封与黄、汴	赵宝俊
〔 161 〕 对南京六朝都城的一些看法	罗宗真
〔 171 〕 明初南京城的规划与建设	张 泉
〔 203 〕 南京明宫城门名考辨	叶晓军
〔 208 〕 举世闻名的南京报恩寺琉璃塔	汪永平
〔 217 〕 清初都城——盛京	李景兰 孙庆永
〔 231 〕 后记	阎崇年

我国古代都城建立的地理因素

史念海

我国历史悠久，先后兴起许多王朝，在统一王朝之外，还有不少的割据政权。各王朝都有自己的都城，甚至还不是一处。有的是新建，有的是因袭前朝的旧规。迄至现在，这些都城有的仅有遗迹可寻，有的还不断发展，成为现代化的城市，至于北京，到现在依然是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首都。

研究古代的都城，在以前曾经成为历史学中一个重要的课题，在当前四化建设中，更有其重要的意义。随着四化建设的迈进，城市建设也日新月异。有的城市就建立在古代都城的基础上，而一些古代都城的遗迹也正在设法加以利用。如何继承和发扬古代都城的优点？如何在旧的基础上创建更多的新城？这些都是值得考虑的问题。正因为这样的缘故，对于古代都城的研究，实为当务之急，不容稍缓。

都城所在地的选择及其建设，对每个王朝或政权都是至关重要的大事，它们也都有各自选择的标准和建设的过程。从这些标准和过程中，可以看到其间的共同之处和互相差异的所在，这里面很可能有一定的规律。这规律可能涉及到许多方面。现在仅就其有关的地理因素，略加论述。

论述古代的都城，应该兼及统一时期和分裂时期，自然

也应该包括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不过最早我们只能追溯到周代。周代以前的夏商两代，都城的迁徙是相当频繁的，本来应加以论述，只是有的问题还有待于深入考证，有的地望还有待于继续确定，故兹篇论述就暂不涉及。

一、探求国土的中心点

都城的最早的作用是王朝或政权以之来统治或控制全国的疆土。达到了这样的目的，王朝或政权才能够说得上长治久安。远古时期有些人设想，为了能够更好的统治或控制，都城所在地以居全国疆土的中央为宜。这就可使它能够面面俱到，发挥应有的作用，不至于有所偏废或貽误。那时的王朝或政权以其所有的疆土为天下，因而都城就应在天下之中。最初明确这样的概念的，应为周公。周公经营洛邑为都城，说这里是“天下之中”，四方入贡的道里相等。^[1]洛邑为现在河南洛阳市。周公经营洛邑是在灭商以后。周人灭商，疆土大为扩展，原来的都城丰、镐就显得偏于西方，难于统辖全局，因而就兴修洛邑作为东都。周人当时的疆土是西起陇山以西，而东至于海滨，北边已越过霍太山，而南及于汉江之阳。洛邑正好大体处于疆土之中，所以周公就把洛邑作为都城。虽然周人并没有把都城从丰、镐迁到洛邑，但对于统治新得到的商人的故土来说，洛邑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周公这样选择“天下之中”作为都城的概念，并不是最新的设想，而是周人长期以来不断探索而获得的一条经验。周人的先世从后稷、不窋以至于太王，也象夏商王朝一样，频繁迁徙过都城。当时的迁徙是受到外力压迫的结果。后来

迁到岐山下的周原，外来的压力减少了，疆土也在不断扩展。周人当时的扩展是趋向东方。周人曾经自豪地说过：“周原膺肬”^[2]。论肥沃，周原却比不上渭河侧畔的程^[3]和丰、镐。程在今陕西咸阳市东，丰、镐在沔河的两岸。于是周人自周原迁到程。由程再迁，就迁到丰、镐。丰和镐虽是两地，相距在咫尺之间。周人一迁再迁，可以说是寻求更为富庶的所在。从周人当时的发展看来，这无疑也是在探索“天下之中”。周人向东扩展并不是没有阻力的，在灭崇而据有丰、镐之后，渭河下游再无其他抗拒的力量。也就是说，周人的疆土已有陇山和华山之间的地区，而丰、镐无疑是在这个地区的中央。不过当时尚无“天下之中”这样的说法，到周公经营洛邑时才具体化了。

这样选择都城的做法，起自周人，也有踵行之者。秦国先世的迁都过程就更为明显。秦国在宗周之世已经开始迁都，那时先后有三次，都在陇山以西。春秋时又迁了三次，最后一次定都于雍。雍在今陕西凤翔县。战国时又继续迁徙，一迁于泾阳（今陕西泾阳县），再迁于栎阳（今陕西临潼县渭河北），三迁于咸阳（今陕西咸阳市东）^[4]。秦国这样多次的迁都，绝大部分都是由西向东迁徙，只有由栎阳迁到咸阳是由东北迁向西南。如果以秦国的迁都和周初比较，前后仿佛同出一辙。当然这中间还有其他原因存在，但寻求全国疆土的中心点，却是完全一样的。

这种观念不仅见之于王朝或政权的实际行动，而且还见之于当世学人的著作之中。出之于战国人士之手的《尚书·禹贡》，就具体列出了五服的制度，就是由都城分别向四方划成五服，每服五百里，五服共两千五百里。也就是说以都

城为中心，距各方的边陲都是两千五百里。《周礼·夏官·职方氏》又提出九服的制度，也是以都城为中心，距各方的边陲都是五千里^[5]。五服、九服和具体的里数，两书所说虽各不相同，以都城为中心却是完全一样的。这些设想和当时的实际情况大体相符，可知其间是有一定的联系的。

不过这种设想很难一直因袭下来。这是因为各王朝或政权的疆土不能老是固定不变，不是有所扩展，便是有所缩小。不论扩展或缩小，不会在周围各处都完全相同，就象《禹贡》和《职方氏》所说的那样，周围最远的地方距都城皆是两千五百里或五千里。秦灭六国后就无法保持这样的均势，以后的王朝或政权也都难办到这一点。固然这其中有些地理方面的缺陷，不过主要应是由于人为作用而形成的。后来的王朝或政权都在设法弥补这样的缺陷。秦始皇帝修筑驰道，就是其中的一个措施。驰道以咸阳为中心，向外辐射，“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6]道路既加修整，置邮传命，当会更为迅速。应该指出，这些人为的设施乃是在奠定都城之后作出来的，和选择都城的因素倒是没有很密切的关系。

二、利用交通冲要的位置

道路的通塞应是选择都城的另一个条件。就在西周时，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周道如砥，其直如矢”^[7]，周人曾经为此而夸耀过。秦始皇帝的驰道虽曾见誉于后世，然确为西汉王朝的建都长安创造了若干有利的条件。长安和咸阳中隔

渭河，南北相望，实际上本是咸阳的乡聚^[8]，以之作为驰道辐射的起点，并没有很多的不同处。只是当时倡议建都关中的娄敬和张良都没有把这一点明确地提出来。

最能体现这一地理因素的，当推北宋的都城开封。开封为什么能够成为北宋的都城？就是因为它处于“四达之会”^[9]。具体说来，它是当时漕运四河的集中点。这四河为汴河、黄河、惠民河和广济河^[10]。汴河由今河南省荥阳县广武山北旧河阴县引黄河水东南流，经过开封，到泗州（治所在今安徽盱眙县）入于淮河。当时的黄河由广武山北向东北流去，故距开封稍远，不过黄河中的船运，还是由汴河达到开封。惠民河即蔡河，它是由开封西南引闵水合于原来的蔡河，南流至陈州（治所在今河南省淮阳县）合于颍河。广济河为五丈河，由开封东流，历曹（治所在今山东省定陶县西南）、济（治所在今山东省巨野县）、郛（治所在今山东省东平县），汇于梁山泊。这几条河都交会于开封城下^[11]。这和上面所说的咸阳或长安一样，只是它是借着水道向外辐射。这些河流都可转运漕粮，供应开封。开封的百万兵民皆恃此为生。这一点是北宋不能不以开封为都城的主要原因^[12]。

其实，最初认识到开封有这样有利的地理因素的，还应上推到后晋的石敬瑭。正是由于石敬瑭开始在开封建都，后汉、后周以及北宋都踵行故事。石敬瑭以开封为都时，曾颁布过一份御札，说：“当数朝成伐之余，是兆庶伤残之后，车徒既广，帑廩咸虚。经年之挽粟飞刍，继日而劳民动众，常烦漕运，不给供须。今汴州水陆要冲，山河形胜，乃万庾千箱之地，是四通八达之郊。爰自按巡，益观宜便，俾升都

邑，以利兵民。汴州宜升为东京，置开封府”^[13]。这份御札说得十分清楚明白，开封成为都城，正是因为它的交通便利，漕运容易。其实，石敬瑭时，开封主要还是凭借一条汴河，他如五丈河和蔡河的治理疏浚，皆是在后周世宗时^[14]。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封才成为水道交通的中心。北宋正是充分利用这些成就来建立都城的。

现在的北京，辽时始建为南京；金元而后相继作为都城。这些王朝在此建都，自各有其设想和目的。这在后文将另行涉及。但是，作为交通中心，北京远在战国秦汉时就已有区域性的基础。那时的燕（其故地就是现在的北京）所以成为勃、碣之间的都会，就是因为它“南通齐赵，东北边胡”^[15]的缘故。《辽史》论南京的形势，就说“其外，有居庸、松亭、榆林之关，古北之口”^[16]。居庸关在八达岭下，今已为游览胜地，无容再作解释。松亭关在今河北省宽城县西南。这里所说的榆林关当系榆关之误。榆关亦作渝关，也就是今山海关。古北口在今北京市密云县东北。这四个关口正是四条交通要道经过的地方，松亭关更是辽时自南京通往中京（今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西）的主要道路。这几条道路再加上南向通往各地的道路，就使当时的北京成为交通的中心。在辽和金、元三个王朝统治时，燕山上的三关一口固然重要，而通往中原的道路尤为控制其南部各地或当时整个中国最不可缺少的环节。到了明代，这个交通中心的所在，更饶有意义。在明代，通往中原的道路并未减少其重要程度，可是燕山上的三关一口却关系到明代的国运。明代最终的覆亡正是来自山海关东的敌手。当时的北京恰是位于这通过三关一口的道路的集中点。这个集中点控制了这四条道

路，照顾了由西北到东北各个方面。明代能与这些方面的敌对力量相周旋，诚然是用了全国的精力，与都城的位置却有莫大的关系。

三、凭恃险要的地势

历代的王朝或政权都期望以其都城为基础统治或控制其所据有的地区或整个的国土，更期望其都城不为外力所攻陷或摧毁，使其国运能够长治久安，亿万斯年。如何能达到这样的目的？只有利用地理的形势，再加上人为的努力。也就是说要注意地利与人和。古人说过：“国之大事，在祀与戎。”^[17]古人讲究祭祀，那是不必说的了。戎指的是兵力，只有用兵力才能保障社稷的安全。历代王朝或政权都在其都城及其附近驻有相当的兵力。唐初实行府兵制度，全国共有折冲府六百三十四个，都城所在的关内道就有二百六十一一个^[18]，而京兆一府有一百三十一一个^[19]。宋仁宗庆历时，天下兵额一百二十五万九千，而禁军、马步两部分就有八十二万六千。禁军的任务是守京师，备征戎，故绝大部分驻在都城开封^[20]。这大概是在都城驻兵最多的朝代。养兵需要钱粮，费用巨大，北宋时已有人慨叹“国用所以日屈”，就是由于养兵太多的缘故^[21]。因而在人和之外，还须讲求地利。春秋时，晋平公曾经自豪地说：“晋有三不殆，其何敌之有？国险而多马，齐、楚多难。”^[22]晋国表里山河，全国都可说是险要地区，这当然包括它的都城在内。晋平公这样自夸，并不是没有来历的，古人就曾经说过：“王公设险，以守其国。”^[23]这里所说的险，指的是地险，也就是山川丘陵

的险要去处。正因为如此，历来选择都城对于其附近的山川丘陵，就特为注意。

最能道出此中真谛的，要数西汉初年的娄敬。当时汉高祖决定建都于洛阳，娄敬就问：“陛下都洛阳，岂欲与周室比隆哉？”高祖回答说不错。娄敬接着说，“陛下取天下与周室异”。周室积德累善十余世，才有历年久远，而汉高祖之得天下，“大战七十，小战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脑涂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胜数，哭泣之声未绝，伤痍者未起”，娄敬认为如此“而欲比隆于成康之时，臣窃以为不侔也”。最后娄敬提出了建都关中的建议，他说：“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也。”^[24] 娄敬在这里虽也提到关中是天府膏腴之地，实际上着重在讲秦地的地理优势。秦为四塞之国，早在战国时，苏秦已经提出这样的看法。唐人张守节对此作过解释，他说：关中“东有黄河，有函谷、蒲津、龙门、合河等关；南山及武关、峽关；西有大陇山及陇山关、大震、乌兰等关；北有黄河南塞：是四塞之国”。^[25] 这样的解释稍嫌泛了一点，却还相当具体，曲尽关中的形势。正是由于关中具有这样的形势，娄敬才提出建都于此的建议。他还以人的搏斗作比喻，指出在搏斗时，不搯住对方的颈项，打击对方的背部，就不能算是获得全胜。他说，建都于关中秦的故地，那也就是搯住了天下的颈项，打击了天下的背部。张良对于娄敬的话，更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他说，在关中建都，乃是“阻三面而守，以一面东制诸侯。”^[26] 这是说关中的南、西、北三面都有崇山峻岭，可以阻隔称兵侵犯的武力，而且在当时这三面都还没有诸侯的疆土，用不着

多顾虑。关中的东面同样也有有利的地势，更有一座函谷雄关，因而可以控制关东的诸侯。这些话确实打动了出入于戎马战阵中的刘邦，他即日下令以关中的长安为都城。

娄敬和张良的设想，只是为了对付国内的不安因素。至于对付域外来的侵犯，在古代的都城中也并不是没有例证。明初本来建都于应天府，即今天的南京，成祖时才迁到北京。作为防御外敌的都城，北京是有一定的条件的。明初，北方的防线远在北京以北，当时在北边设置开平（今内蒙古多伦县西北）、大宁（今内蒙古宁城县）、东胜（今内蒙古托克托县）诸卫和辽东都司所治的辽阳城（今辽宁省辽阳市）。自西徂东，宛然一线，互为犄角，可以随时呼应。曾经有人比之于汉的河西和唐的朔方^[27]。这样就加强了北边的防守，保障了都城的安全。不过作为都城的屏蔽，还应该较近的地区探求。实际上燕山和太行山北段正起到这样的作用。明代在这两座大山上设关较多，在燕山上的有居庸、松亭、喜峰口、渝关，在太行山北段的更有紫荆和倒马关。这是几座名关，其他较小的关隘还不在此少数。这些关隘的设置，是对自然形势的配合和利用，使当时的都城更显得牢固。

一些都城的选择也曾注意到河流在防御方面的作用。现在的南京，除上面提到的在明初作为都城外，三国时的吴国和其后的东晋、宋、齐、梁、陈诸朝先后都在这里建过都城。吴国的疆土主要是在江南，其都城数经迁徙，而建业为时较久。建业就是现在的南京。吴国以建业为都，虽自有取意，然大江之险确实是其都城安全的屏障。魏文帝曾至广陵（今江苏扬州市）观兵，看到江涛汹涌，慨叹说：“固天所

以隔南北也！”^[28]东晋、南朝皆偏安一隅，朝夕忧惧，只恐北方强兵南下。以建康（即建业）为都，当然是仰赖这一线大江。建都初期，一些人士还有一点较远的眼光，惟恐防江不成，宗社便要倾覆，因而打算防河。防河不成，就防淮；防淮不成，然后再全力防江。当时确也还有若干力量，在从事实现这样的设想。桓温、刘裕的先后北伐，虽胜败不一，要皆不以江淮为限。后来防河已经没什么指望，防淮便成了要务。南北两方为了争夺这条长淮的险要，都是在竭尽全力的。到了长淮为北朝所据有，南朝就只好守江了。象大江这样川流在军事上的重要意义，就是北朝的人士也应都是清楚的。还在南齐明帝时，北魏的陆叡就曾说过：“长江浩荡，彼之巨防。”^[29]正是由于有这样的巨防天险，南朝才能够多延岁月。

四、地理因素与对外策略

一些王朝或政权在选择都城时，往往与其对外策略相联系，选择都城是为了实现某些策略；也有些王朝或政权因为其都城居于某种有利的形势，因而也影响到当时或后世的对外策略。

前面说过，西周初年的建都，是为了迁到更为富庶的地区和其疆土的中心。其实周人早在周原时，就已有了翦商之心^[30]。只是由于力量有限，而周原也远在西陲，未能完此大业。后来作邑于丰，并且把都城迁到那里，这就使东征有了可能，武王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伐纣灭商的^[31]。

战国时，秦国的迁都也有同样的意图。前面说过，春秋